

Strangers at the Gate

大门口的 陌生人

(增订版)

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美)魏斐德 著

王小荷 译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Frederic Wakeman, J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

[增订版]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大门口的陌生人

Strangers at the Gate

〔美〕
魏斐德
著

王小荷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门口的陌生人: 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 (美) 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Jr.) 著; 王小荷译. —2 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133-2378-9

I. ①大… II. ①魏… ②王… III. ①广东—地方史—1839—1861 ②鸦片战争 (1840—1842)—史料 IV. ① K296.5 ② K2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5045 号

大门口的陌生人: 1839—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美) 魏斐德 著; 王小荷 译

出版统筹: 刘丽华 向珂

特约编辑: 徐圣洁

责任编辑: 汪欣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70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17年2月第二版 2017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378-9

定价: 5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纪念魏斐德先生诞辰八十周年

编者说明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以下简称《大门口的陌生人》）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于1965年写成的博士毕业论文，后被作者增补成书后于1966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本书从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华南地区的地方史研究入手，呈现出传统中国社会在遇到来自西方的挑战时作何反应，重现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晚清民众史。

《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魏斐德针对中国史研究的早年成名之作，后来被我国历史学家王小荷译成中文。魏斐德在书中运用讲故事的方式，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从“地方视角”到“世界视野”，揭示出官方历史表层之下的社会动态与民众选择。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对《大门口的陌生人》中的特殊视角给予高度评价：“众多历史学家常聚焦于官方史、外交史、精英史，而魏斐德触到了他们很少涉及的“民众史”，即某事件对社会大众、底层人物的影响。”

本书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文版已有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重新修订，

订正若干讹误，并增加了序言、插图和代后记。序言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李雪涛教授拨冗撰写。代后记《马克·布洛赫——一个历史学家的肖像》是魏斐德1962年写成的学术随笔，2013年由魏斐德的夫人梁禾女士翻译为中文。这些图文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并感知魏斐德进行中国历史研究的缘起与早期成就。

此次出版《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增订版之际，正值魏斐德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我们谨以此寄托对这杰出历史学家的怀念。在此，特别感谢魏斐德先生的夫人、旅美著名翻译家梁禾女士，她为我们再次提供了魏斐德先生的部分一手资料。

编者

2017年1月

增订版序：冲击—回应说的社会史解读

引子

1965年，28岁的年轻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在他的老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的指导下，完成了他题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的博士论文。论文探讨的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期的华南，特别是广州一带的社会问题。拿到博士学位后的魏斐德，成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轻的历史学助教。1966年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改名为《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以下简称为《大门口的陌生人》），作为一本专著由位于伯克利的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¹

这本书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地方主义（Localism）研究的先河，并且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方主义，而是在世界主义基础之上的“地方主义”：

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的见解, 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 是地方主义 (provincialism) 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存。列文森反对中国式的调和论, 即那种以世界主义掩盖、消融地方主义的文化冲动。…… (魏斐德的——引者注) 结论是地方世界主义, 既保持自我, 又接纳世界。²

这样的—一个定位对魏斐德来讲是非常准确的。这正是年鉴学派所强调的“总体史” (l'histoire totale) 的意义所在。历史综合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横向叠加, 而更应当是点和面的结合, 如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结合。在微观个案研究的同时, 加强对中国社会长期发展进程的宏观研究, 如此才能真正推进整体的中国历史研究。这也正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所谓阐释学循环 (Hermeneutischer Zirkel) 的方法: 在理解中, 必须根据构成文本的各个部分来理解文本整体, 又必须根据文本整体来理解文本的各个部分。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³

魏斐德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依据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的传统, 基本上是政治、经济史的宏大叙事, 常常是单纯的“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他们所强调的是由于贸易体制的差异而产生冲突, 其结果是战争和条约。魏斐德接受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理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的结构, 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内部的变革, 只有外来的冲击才能使中国突破传统的束缚, 发生与世界同步的质的变化。但他另辟蹊径, 不是从国家, 而是从社会出发, 从广州的地方史研究入手, 解释传统中国社会在遇到来自西方的挑战时, 是如何做出回应的, 从而揭示出官方历史表层之下的社会动态。

曾经作为魏斐德教授弟子的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1942—) 在谈到魏斐德的这部著作时指出:

太平天国的起因是他（指魏斐德——引者注）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目标。但是他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自己在改变——他发现自己在研究的是鸦片战争对社会民众、社会底层的影响。而费正清的研究却很少涉及到像你所说的“民众史”，或某事件对社会大众、底层人物的影响，他所研究的都是官方史、外交史、精英史。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魏斐德来讲，史料的范围被极大地扩展了，很多的县志、秘密社会的史料都被挖掘出来，构成了书写地方史的重要内容，而不像传统史学那样局限于官方的文字资料。有关魏斐德地方史方法论的来源，周锡瑞也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

任何一个研究地方史的人必须研究当地的官员，包括知县、知府、巡抚、总督，还得研究国家政策及政策的制定者及国家级的官员。另外，还得研究官方以外的各种地方势力，和各种各样结社以及这些结社的运转状况。当地的经济状况也不可忽视。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因素。这种研究方法在法国是非常普遍的。别忘了魏斐德先生曾在哈佛学过一段欧洲历史。他的法语和西班牙语棒极了。他曾博览群书，花了大量的时间去了解如何研究史学，例如，法国革命史学。因为法国的年鉴派所写的很多关于法国革命的文章同样也是地方史。⁵

魏斐德尝试着将法国史学中的地方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去，并且凭借《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本人在访谈中承认：“真正造成了这一变化的是来自法国的学术风气。我在大学本科念的是法文，法国学者所做的工作引导我用不同的方法来考虑中国问题。……我选择了太平天国……首先触动我的是法国历史学者处理通俗社会史的方法。我想正是这样的影响让我避开了所谓冲击与

反应模式和局限在精英阶层的国际政治史框架,我感兴趣的是地方史。”⁶他在别处也认为“广东的这种情况也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时将在全中国发生的情况。”⁷在魏斐德看来,1839—1861年在广东所发生的社会变动对整个中国来讲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正是华南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拓展了魏斐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鲜明的问题意识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全书的正文按照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时段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第二部分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第三部分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第四部分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1861）

这四个部分都是以“政治”（the Politics）为中心展开的。魏斐德在第一部分想要处理的内容是，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官府、地方士绅、团练民众等）对洋人的态度。三元里抗英事件，尽管对英国人来讲不过是一场小冲突而已，但其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后来的爱国主义宣传，更重要的是对于其后历史事件的影响：对于之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动华南的问题——如团练运动、太平天国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来说，它是中外关系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后面发生的事。⁸

第二部分的标题“大门口的陌生人”处理的是中英《南京条约》之后广州城乡民众反入城的运动，同时还包括这一时期团练、社学的异军突起、对条约的不同理解，以及所谓反入城胜利的社会后果等等。

在第三部分中，魏斐德对华南社会的各阶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包括宗族、秘密社会、太平天国与广东以及红巾军的叛乱。这一部分实际上是魏斐德这项研究的重点，他的初衷是以地方史和社会史的方式，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来做“个案”研究。

在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中，魏斐德让我们看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广东被迫纳入世界体系的艰难进程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反抗。实际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之中，其间有很多的事件都是重叠在一起的。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之后，广州人逐渐接受了夷人成为一种稳定政治力量的事实。

魏斐德在“导言”中明确地指出，与世隔绝的中国是在鸦片战争后才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的。他所展现的内在逻辑关系大致如下：西方的入侵——广东团练的勃兴——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转变——阶级矛盾的激化——秘密会社和太平天国——社会的更加无序——儒家学说遭到质疑——天朝崩溃的前奏。在魏斐德看来，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20年，在广州的历史是入侵、抵抗、自治和合作的过程。

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选取了华南特别是广东作为一个横截面，通过对这一地区典型状态下各社会群体关系的动态变化的研究，来挖掘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做出的反应。希望通过一个具体地方的研究来透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从而折射出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魏斐德将官方所修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看作是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的社会史，是以往史学家所忽略的。⁹

魏斐德为什么选择广州或者说广东的地方史作为他研究的入手处，这当然是因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的中国近代史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地区或其附近。“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这一分析单位有着其内部的一致性。”¹⁰ 魏斐德比较了广东与广西的形势，反问道：“为什么广西的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

留在复国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革命素质呢？”¹¹

在此，魏斐德依然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甚至使得反叛者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只有外来的“冲击”才使得这种革命成为可能。¹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尽管在形式上洪秀全同样是一个应试落第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力量的源泉——西方”。¹³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的原因在于它依据西方的理论公开向儒家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形成了日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¹⁴

此外，仅仅从魏斐德为这部书所取的名字“大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按照费正清“冲击—回应说”的思路，来论述“陌生人”来了之后给超稳定的中国华南社会所带来的变化。这一论点他在《历史变化的模式：1839—1989年中国的国家与社会》(1991)中阐述的则更为清晰：

这种本质上不变化的历史——用黑格尔提出的准则看，是反复性的，而非历史——由于1839年西方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由鸦片战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后果，以及中国千禧年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结合，太平天国叛乱激发了。¹⁵

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当然是西方冲击的结果，它的出现就像是多米诺效应一样，使得帝国瓦解：“太平天国对自我维系的华—夷帝国专制主义(Sino—barbarian imperial despotism)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其结果是帝制开始大崩溃。”¹⁶

魏斐德并不认为，仅仅是出于西方列强的冲击而使得中华帝国走向

灭亡。他恰恰认为是内忧和外患的共同作用——亦即内部的和世界的两个进程的汇合，才使得“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的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¹⁷而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并非完全中国式的行为。归根到底，内忧和外患的直接导火索都可以归在外部冲击的原因上。

团练的兴盛——士绅社会地位的变化

“Gentry”一词（也被翻译成“绅士”、“缙绅”）在英格兰最初所指的是没有头衔的乡绅。自16世纪以来，这一概念的含义日益扩展，包含了没有明确界限的中上市民阶层或低等贵族、较高级的贵族阶层，乃至地主和神职人员，到了19世纪，甚至学者也被纳入其中。不过这个名词在西文中的含义也有很多的歧义，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很大，而在法国和德国情形则完全不同。

除了在欧洲之外，这个词还在英文有关中国历史的描述中常常被使用，用来专指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约占人口的1%，是当地的名流。在传统的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家族和士绅也常常是他们分析中国社会的重要单元。魏斐德对这个词作了比较详细的界定：

此处“士绅”一词的用法是最广义的。虽然它常用来指有功名的人，但事实上，士绅是由那些当地可能有官职也可能没有官职的人组成的一个声望显赫的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自己的地位——经济上收租、放债，政治上代表本地各界，发挥官僚阶层后备军的作用。¹⁸

这一独特的社会阶层实际上构成了半官方性质的政府和社会管理阶层。“士绅”既是魏斐德研究广东的关注点，同时也是他探讨广东和近代中国社会特点的一根红线，贯穿了他的整个研究进程。他希望通过研

究广东地方士绅的社会角色的转变，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具体探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他一开始便对三元里抗英的事件进行了分析，这一对英国人来讲仅仅是“小冲突”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便集聚了一百多个村的几万人。¹⁹魏斐德认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地方士绅，士绅领导了团练，并且规模如此之大是空前的。

他认为，士绅在中国传统儒家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到了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府州县官与士绅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来进行统治。²⁰他进一步认为，在一个只是由为数不多的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士绅是中央政权不可不倚重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州县官根本不用指望在当地收取租税、维持治安。社会福利、公共事业、防卫、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此时或彼时交给士绅去做。²¹不过，尽管州县官在很多问题上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士绅，但如果士绅所起的作用过大，官员就会大权旁落。²²这是必须要极力避免的。

此外，朝廷最关心的实际上是农民起义时士绅的态度。魏斐德指出，农民起义的领袖，“只有获得重要士绅的指教和协作，才有望‘改朝换代’。……虽然并未明言，但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无疑是清朝统治政策中的重点。士绅可以帮助朝廷统治人民，但决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²³因此，“士绅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此消彼长。”²⁴

对于士绅来讲，他们调动地方力量的重要形式是“团练”。由于广东沿海地区历史上就一再有海盗的不时侵扰，组织团练就成为了经常性的工作。魏斐德指出：“在鸦片战争前30年把海盗从内河驱赶出去的经验，对后来的团练却极为有益。从那以后，团练及雇佣兵就经常分散在广东各地，一旦地方形势吃紧，他们随时应召。”²⁵

由于鸦片的泛滥，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1785—1850）在1839

年3月到达广州之后，为了对付乡村地区的鸦片吸食者，建立了保甲制度。后来因为保甲制度不起作用，林则徐为了寻找可靠的担保，不顾乡村统治的一条重要教训，决定将士绅纳入他的新的管理网络之中。

林则徐在广州长寿寺开设了一个鸦片收缴与情报机关，士绅们也在城内大佛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监视机构，在郊区，林则徐则给予香山县名流黄琮以组织乡勇的权力，并可以依据他本人的命令，逮捕并处死“汉奸”及鸦片贩子。此外，乡村的保甲也被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改造为军事组织。²⁶

实际上，林则徐在禁烟行动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士绅的力量，并且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士绅控制保甲和团练得到了官府准许。相随而来的是士绅在鸦片战争中参与了军事活动。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与地方显贵间关键性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后者有利了。”²⁷

实际上，士绅阶层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中地位显著提升，原因之一也在于官府的失信于民：他们既同民众站在一起支持团练与洋人作斗争，又暗中与洋人妥协。魏斐德指出，三元里事件是团练得以迅猛发展的标志：“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官府意识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间‘概念化’和个体的压抑情绪，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承载组织——民间团练。”²⁸ 这之后，广州成立了几个团练局，不过真正继承了这种全民皆兵做法的机构是升平社学。

如果说早期的团练起到了团结地主与农民的作用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由于经济危机、宗族关系、反洋人运动等使得乡村联合，团练不再是民众自卫的手段，而变成了掌握在有钱名人手中的社会控制机构。魏斐德指出，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²⁹ 从而使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起到润滑地主与农民关系作用的士绅阶层，攫取了帝国的权力，促进了天朝的崩溃。士绅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变化，成为了当时帝国中最大的变动因素。

魏斐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不公正都是 19 世纪中叶权力平衡被破坏的直接结果。³⁰

在传统意义上，一个村的团练常常是一个家族组织，家族间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也都以此为中心展开。在此类的团练中，血缘关系和阶级关系融汇在了一起。鸦片战争后，不同家族的士绅和士绅之间，佃户与佃户之间的联系加强，从而使得佃户们意识到，尽管他们与士绅有着血缘关系，但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毕竟是不同的。此时的血缘关系已经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关系了。至此，家族的阶级属性终于暴露出来了。³¹

因此，对于魏斐德来讲，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变化是与士绅阶层的角色、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加速了帝国的分崩离析，最终成为了清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

汉奸

我想，“汉奸”这个词，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其中的妙处。只要一个人被冠以汉奸的名称，那么此人的一生就彻底完蛋，并且会遗臭百年。《新汉德词典》将这个词翻译成“(chinesischer) Landesverräter”，³²从而使“汉奸”变为了“卖国贼”。魏斐德的英文翻译成“Traitor”，尽管也有“卖国者”的意思，却也很难传达“汉奸”一词的微妙含义。现今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 1954—）由于其推行的难民政策而被德国东部的媒体称作“Landesverräterin”，显然不能翻译成“德奸”，而只是“卖国者”或“卖国贼”而已。

《汉语大词典》给“汉奸”的定义为：“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民族利益的人。”³³尽管这一名称的来源并非自鸦片战争开始，但在此之前并不流行，也未成为一个现代民族主义的话语。正是魏斐德所研究的这一段历史，使得“汉奸”一词重新活跃起来。因此，伦敦会（LMS）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的《英华词典》(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1823) 并没有收录“汉奸”一词。在双语词典中, 1892年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 在上海出版的《华英字典》第一次收录了“汉奸”, 并作了解释: 汉奸, a traitorous Chinaman, a spy。³⁴

据魏斐德的考证, 早在19世纪初, 嘉庆皇帝(1796—1820在位) 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³⁵ 至少到1823年, 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 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³⁶ 对于儒家来说, 文化就是一种技术, 掌握了它们, 包括文字, 就意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因此, 最大的叛徒是那些通过教蛮夷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³⁷ 1759年, 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 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马礼逊的弟子梁阿发(Liang A-fah, 1789—1855), 曾借广州府试之机将基督教的小册子发给考生, 当局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 是“汉奸”。³⁸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 “汉奸”一词的意义变得更加混乱, 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被归于“汉奸”之列。³⁹ 作为传统士大夫中的一员, 林则徐完全看不起那些广东商人。1839年12月, 在清政府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 林则徐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 把他们称作“奸商”。他当年发出的《密拿汉奸札》中称: “照得本部堂恭膺简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 首在严拿汉奸。缘外夷鸦片之得以私售, 皆由内地奸民多方勾串, 以致蔓延日广, 流毒日深。”⁴⁰ 据魏斐德的研究, 林则徐已经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表明, 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 而是那无数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⁴¹ 也就是说, 跟入侵者英国人相比, 这位钦差大臣更痛恨所谓的“汉奸”。

林则徐在广州所建立的一套复杂严密的禁烟制度, 也包括对告密者给予重赏。曾任英属东印度公司翻译的新教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在追述这一段的历史时写道: “监